

文章与性情

阅读梁启超



新旧两界线中心
过渡时代之人物

用一生贯穿了中国
近代史

阅
读

梁
啓
超

夏
晓
虹
著

人民
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文章与性情

阅读梁启超

夏
晓
虹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阅读梁启超·文章与性情 / 夏晓虹著. — 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9.7
ISBN 978-7-5207-0687-2

I . ①阅… II . ①夏… III . ①传记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68003 号

阅读梁启超：文章与性情

(YUEDU LIANGQICHAO: WENZHANG YU XINGQING)

作 者：夏晓虹

责任编辑：闫 妮 葛 畅

特约编辑：白华昭

装帧设计：张 军

出 版：东方出版社

发 行：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北里 51 号

邮 编：100028

印 刷：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9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：12.75

字 数：290 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-7-5207-0687-2

定 价：58.00 元

发行电话：(010)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

版权所有，违者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我社负责调换，请拨打电话：(010) 85924725

目 录

总序 / 001

结缘梁启超（代序） / 007

辑 一

梁启超曲论与剧作探微 / 015

一、剧作考实 / 015

二、“戏曲为优美文学之一种” / 021

三、“以中国戏演外国事” / 028

四、“在俗剧中开一新天地” / 039

梁启超的文类概念辨析 / 052

一、“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” / 052

二、“诗本为表情之具” / 061

三、“情感之文美术性含得格外多” / 072

梁启超文艺观刍议 / 085

一、文化史视角 / 085

二、“文学救国”论 / 094

三、“情感中心”说 / 100

梁启超的文学史研究 / 109

一、改良群治与有益人生 / 109

二、科学精神 / 117

三、文化视角 / 137

四、历史意识 / 161

《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材源考 / 177

一、《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的原材料 / 177

二、以来往信件为主的年谱编纂体例 / 186

三、作为史料底本的《〈申报〉康梁事迹汇抄》 / 199

辑 二

清学的有用与无用

——读梁启超的学术史二种 / 213

考据与图表的现代功用

——读梁启超《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》 / 220

梁启超与《和文汉读法》 / 226

近代传记的新变 / 238

谁是《新中国未来记》第五回的作者 / 247

也说梁启超的“盗用” / 255

共和国民必读书

——《国民浅训》百年纪念 / 259

十年一剑？

——《〈饮冰室合集〉集外文》序 / 272

辑 三

学者梁启超 / 281

以觉世始 以传世终

——梁启超与二十世纪中国 / 286

著论求为百世师

——说梁启超的“善变” / 294

作为史学家的梁启超

——“梁启超史学著作精校系列”总序 / 303

寂寞身后事

——时人眼中的梁启超 / 309

梁启超的家庭形象

——读吴荔明著《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》 / 322

梁启超与吴其昌

——吴其昌著《梁启超》前言 / 326

辑 四

寻找梁启超澳洲文踪 / 339

一、缘起 / 339

二、墨尔本 / 342

三、悉尼 / 346

四、北京 / 350

五、布里斯班 / 353

菊砚端砚尽关情 / 354

登陆塘沽

——梁启超流亡归来 / 358

来自巴黎的警报

——“五四”期间的梁启超 / 362

梁启超墓园的故事 / 371

一、梁启超墓与母亲树 / 371

二、先行安葬的李端蕙夫人 / 376

三、墓园的购建经过 / 381

四、提前到来的梁启超葬礼 / 384

五、墓园的兴衰与逝者的命运 / 389

初版后记 / 391

总序

自从1983年开始阅读《饮冰室合集》，梁启超即成为我关注最久、投入最多的研究对象。迄今为止，我出版过三本有关梁启超的研究著作，即199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首印、中华书局2006年再版的《觉世与传世——梁启超的文学道路》，2006年由三联书店印行的《阅读梁启超》，以及2014年由东方出版社刊发的《梁启超：在政治与学术之间》。此外，我还编选过《梁启超文选》（上下册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）、《梁启超学术文化随笔》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）、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·梁启超卷》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）与《大家国学·梁启超》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），校勘过梁启超的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）、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（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）与《国学小史》（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），后二种系与陆胤合作，辑录过《追忆梁启超》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）。其中规模最大的则是三册、一百四十多万字的梁氏佚作汇编《〈饮冰室合集〉集外文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），书序收入三联版的《阅读梁启超》时，我补拟的标题颇为感慨地用了《十年一剑？》。

愿意为一个研究对象付出如此多的时间与精力，可想而知，

此人之于我必定意义重大或魅力十足。仔细想来，梁启超有如下三方面优长对我深具吸引力：

首先，我做近代文学研究，是从梁启超起步的。日后回想，我一直很庆幸这一选择的正确，甚至可以说是英明。因为从哪里入手，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一个学者将来的研究格局。我非常欣赏梁启超关于“理想专传”的构想：“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”。此处的“伟大”不单指“人格的伟大”，也包括“关系的伟大”，后者甚至更重要。因此，传主应是“可以做某个时代的政治中心”或“某种学问的思想中心”一类人物，亦即“一时代的代表人物，或一种学问一种艺术的代表人物”（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分论一《人的专史》）。如果倒转此一借人物写时代的角度，而从观照一个时代的政治、学术以至文学的流变着眼，那么，这些处在关系网络中心的人物，无疑会带给研究者更开阔的视野，展现更精确的图景。在我看来，梁启超正是这样的伟大人物。近代中国所经历的文学变革、学术思潮更迭、社会政治改良，梁启超不仅身历，且均为引领潮流的中坚。追随梁启超，也使我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文学，得以进入更为广大的史学领域，让我因此能够走得更远。

其次，很多曾经处于时代中心的人物，已被掩埋在历史深处，不再引起今人的兴趣与关心。但梁启超不同，学术论著不必说，即使影视作品中，也不时可见其身影。起码，到现在为止，梁启超并没有离我们远去。探求个中原因，可以发现，世人对梁启超尽管有多种概括，诸如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宣传家、教育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等等，不过，若从根本而言，实在只有“启蒙者”的称号对其最适切。无论前期的从政、办报，还是后期的讲学、著述，也不管面对士绅抑或面对学子，“开通民智”始终是其一贯不

变的追求。其所启悟的思想、学理固然不乏专门，却多为现代国民所应了解与实践。何况，与其师康有为的治学三十岁后即“不复有进”不同，梁启超“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”（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二十六节）。谓之“善变”也罢，“与时俱进”也好，直到去世，梁启超留在时人印象中的“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，紧跟着时间走的壮汉”（郑振铎《梁任公先生》）。他所写下的带有启蒙气息的巨量文字，今日读来照样新鲜感人。其年轻时的自我期待“著论求为百世师”（《自励二首》其二），也大可如愿以偿。

最后，在为时代写照而挑选作传人物时，“人格的伟大”虽不及“关系的伟大”更获优待，但若长期保持关注，则此一研究对象在品格、性情上，必定应有使人感佩或愿意亲近之处。梁启超虽也投身政治活动，并一度进入官场，却绝少此间常见的恶习。胡适眼中的梁启超，“为人最和蔼可爱，全无城府，一团孩子气。人家说他是阴谋家，真是恰得其反”（1929年1月20日胡适日记），此说最传神。而能够拥有林长民、蒋百里、张东荪、张君勱、丁文江、徐志摩等一班俊彦爱戴的梁氏，其人格之光明磊落亦可想见。而其“善变”虽也会遭人诟病，但在梁启超本人，都是出以真诚，“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，最透澈的见解，最不得已的苦衷”，非如政客的投机逢迎、朝三暮四。况且，即或在变中，梁氏也自有其不变的坚持在，如郑振铎指出的“爱国”宗旨（《梁任公先生》），如我前面提及的启蒙立场。梁启超又自称“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”（《学问之趣味》），这让他做起事来总是兴会淋漓，富有感染力。其爱家人，爱朋友，爱文学，爱书法，爱生活中所有新奇美好的事物，当然也使人乐于与之长久盘桓。

与这样一位时代伟人、启蒙先驱、可爱长者相遇，结缘三十

多年，至今仍不厌不弃，并且，这一缘分还会继续下去，实为本人学术生涯中最大的幸事。

而由于持续的关注与话题的延伸，本人的研究也获得了国内外学界相当的重视。东方出版社精明能干的女编辑姚恋在做过《梁启超：在政治与学术之间》的责编后，一直惦记将我的三本著作集合起来，一并推出，以集束的效应进行展示，这一建议让我颇为动心。此事从去年说起，中经家事波折，延搁到今年6月，方才正式启动。

此次重新编排，按照三书为一整体的原则，除《觉世与传世》保留原貌外，其他两本著作都做了少量调整，具体情况在各书的“附记”中已有交代。同时，为配合成套出版的整齐、美观，书名也经过了统一修改：以“阅读梁启超”为总题，《觉世与传世——梁启超的文学道路》易名为《阅读梁启超：觉世与传世》，《阅读梁启超》扩充为《阅读梁启超：文章与性情》，《梁启超：在政治与学术之间》改题为《阅读梁启超：政治与学术》。

明年1月恰逢梁启超去世90周年，谨以拙作向前贤致敬。

2018年11月22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

附 记

初版最后一辑所录两篇《觉世与传世》旧版、新版序，于今已形同赘疣，不必再重复收入。剩下一篇《〈饮冰室合集〉集外文》序，独木不成林，故调整到散论梁氏著作的第二辑。

同时删去的还有《中国学术史上的垂范之作——读梁启超〈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〉》。此篇放在第二辑本就体例不合，加上近年正陆续为商务印书馆主编的一套“梁启超史学著作精校系列”写导读，其中《新史学》一册卷首亦重刊了此文，故拟连同其他各篇，将来另成专著。

而增加的四篇，正好每辑各一。原先分编的设想是：第一辑为论文，其他各辑为短论或随笔。以此，第二、三、四辑分别关涉梁启超其文、其人与其事。不过，此前所收论文均围绕梁启超的文学研究展开，这回新增一篇《〈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〉材源考》，所论既非梁氏著作，也与文学无干。但这部成于1936年的梁启超年谱一向为学界看重，又是其人、其文与其事的总汇。将此文置于第一辑的末尾，感觉兼有开启以下各辑的意味。

第二辑补进了《共和国民必读书——〈国民浅训〉百年祭》一文。梁启超1916年在生死悬于一线的颠沛流离中，奋笔撰写了《国民浅训》。由此使得这薄薄一册小书在富有传奇性的同时，也以其昭示的国民常识，成为历久不衰的共和国民必读书。很明显，此篇的写作思路与笔者先前所作《梁启超的“常识”观》（收入《梁启超：在政治与学术之间》）相贯联。而行文之际，最大的感慨是，读梁氏百年前文仍无过时感。

第三辑添加的是《作为史学家的梁启超》，副题已表明，此即

上文提到的本人为商务印书馆主编的“梁启超史学著作精校系列”总序，因而专就梁氏的史学品格与贡献立说。第四辑则从《梁启超：在政治与学术之间》移来一文，自以为，《寻访梁启超澳洲文踪》之安放此间，与叙说梁氏其他行迹的文字并列，无疑更为妥当。

本来还可以有更大幅度的调整，如将《梁启超曲论与剧作探微》归入《觉世与传世》，以弥补原先的遗憾。但终究还是感觉论题关注点与之前有所不同，文字风格也不无变化，故还是分在两书为好。

2018年7月26日于漠河北极村

结缘梁启超（代序）

对于读书人来说，大概一生中总有几本书会与之长久相伴，因而构成个人生命流程的一部分。就我而言，这类书中首推梁启超的文集。在我四十五年的人生中，与梁氏文集“剪不断”的日子，竟有十五载之多。今日回思，也觉惊心。

与一部书深深结缘，往往需要特别的契机。我之得以相遇《饮冰室合集》，起初纯粹是出于研究的需要。1983年，我就读硕士研究生已进入第二个年头，两年半的学制时间过去了一半，我该为学位论文圈定一个大致的范围。正在此时，我开始阅读1936年出版、厚达四十册的《饮冰室合集》，那套书在系资料室的书架上，占据了一层的大半格。起初，我还对是否能够读完全书缺少信心；而一旦相接，阅览本身立即变成愉悦的享受，梁启超所自许的其文字“别有一种魔力”（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之二十五节）的效应，竟然历久不磨，在我身上重现。我的论文题目也最终确定为《梁启超的“文界革命”论与“新文体”》，希望有幸揭示魔力产生的谜底。

算起来，1929年去世的梁启超与初读其书的我，中间横亘着半个世纪；我所看到的梁氏最早的文章，更写于近百年以前。可我全然感觉不到其间的距离，那些印在纸上的铅字充盈着生命力，

把一个元气淋漓的任公先生引入我的世界。

中国古来就有“文如其人”的说法，仿佛这是一个文学评论的通则，天生为批评对象所具有，就像一个人的胎记一般，与生俱来。而在我看来，这其实是不易达致的很高境界，虽经努力，亦未必可以企及。对于政治家与学者，尤其如此。但此语移用于梁启超的文章，却极为贴切。

也许是我的偏见，政治家以深谋远虑的理智应世，看重的是社会效果而不是个人趣味，撰文难免带假面具，少见个性；倘若身居高位，更多了一种职业性的“纱帽气”，个体已经消融成为职务的符号，“官样文章”之讥便无可遁逃，然而这还是排除了秘书代劳的情况。学者发言虽有更大的自由度，可学术研究的科学、谨严又要求“言必有据”，可以覆按，司空见惯的“学究气”于是弥漫学界，人们也约定俗成地以之为学术论文的特征。向规范化靠拢的结果，常是个人风格的消泯。

梁启超恰好兼有政治家和学者两重身份，其一生以1917年底辞去财政总长之职为分界，区划为政界与学界两段生涯。尽管作为政党领袖与大学导师必须面对不同的大众，梁启超却能够始终如一地坦露胸襟。无论所写为何种文字，作者的个性总是分明可见。

不妨抄录几段当年令我动心的话，以作佐证。

1899年底，意欲远游美国的梁启超开始写作记录此行的《汗漫录》（又名《夏威夷游记》），心中洋溢着“生二十七年矣，乃于今始学为国人，学为世界人”的自豪。其自述平生履历的一段话便说得相当动情：

余自先世数百年，栖于山谷。族之伯叔兄弟，且耕

且读，不问世事，如桃源中人。余生九年，乃始游他县，生十七年，乃始游他省，犹了了然无大志，梦梦然不知有天下事。余盖完全无缺不带杂质之乡人也。曾几何时，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簸荡、所冲激、所驱遣，乃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，浸假将使我不得不为世界人焉。

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“思想解放”的高潮中，读到如此贴切的话语，发觉梁氏的决心仍然适用于今日中国——“既生于此国，义固不可不为国人；既生于此世界，义固不可不为世界人”——而岁月流转，已近百年，在生出亲切感的同时，也不免伴有些许悲凉。

1901年，正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写下《自励》二首，全无去国万里、飘零天涯的苦态，而满怀“著论求为百世师”“十年以后当思我”的极度自信，令人不得不佩服其乐观与远见。此前一年面世的《少年中国说》，更是豪气干云。开篇一连串的比喻精彩绝伦，诸如“老年人如僧，青年人如侠；老年人如字典，青年人如戏文；老年人如鸦片烟，青年人如泼兰地酒”；“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，青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”，放入当时的语境，其奇思妙想，新颖别致，足以倾倒人心。而文章对未来中国的理想描述，又分明带有青年梁启超意气风发的个人印记。

在随后几年陆续刊出的一系列学术论文与外国思想家学案中，梁氏当仁不让地认真履行其导师职责，于输入新知之际，仍保持了选择的主体意识。以按语形式出现的议论，也往往将话头引向中国现状或作者自身，使读者在读文时也能读人。最有名的当属《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》的自我评定：“若夫理论，则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，且不倦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。”虽因

言论不断改易而受到“反复无常”的责难，但处于形势急剧转化的过渡时代，梁启超之“善变”反而成全了其不落伍，郑振铎因而对 56 岁去世的梁氏有“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，紧跟着时间走的壮汉”（《梁任公先生》）的印象。

完稿于 1920 年的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总结了三百年来学者的贡献与缺失，对作为个中人的自己，梁启超也站在第三者的立场，客观地加以评说：

启超务广而荒，每一学稍涉其樊，便加论列；故其所述著，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，甚者纯然错误；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，则已前后矛盾矣。平心论之，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，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，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；就此点论，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。虽然，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，以其人本身之魄力，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，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；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，则在中国文化史上，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。

在我平生的阅读经验中，还从未看到如此苛刻而自负的坦诚自责，其针砭准确、褒扬得体，也只能出自梁启超这位性情中人之口。此语也可视作梁氏对自己的“盖棺论定”，我们实在找不出比它更精到的历史定评。

除鉴赏其人，读其文，还时有精妙的议论启人心智，引人神往。因此类例证太多，不暇枚举，略翻其书，观者自可领会。

不过，仍然值得一说的是梁启超的两次系列讲演：一为 1912 年 10 月归国后在各团体欢迎会上的发言，一为 1922 年应南北各